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考察

谢 小 飞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贯穿于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经历了由“均中求富”到“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由非均衡发展再向区域协调发展的转变,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认识形式和具体样态,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区域均衡发展统筹推进沿海和内地、汉族和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顾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发现,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这些启示将为我们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中继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历史经验。

关键词:共同富裕;城乡差距;区域协调;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027-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03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共同富裕也成为关乎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旋律、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实现效度的高频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党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近年来,学界研究较多地关注和阐释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来实现共同富裕。如有学者提出的破解路径是“输血”“造血”双管齐下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1],构建我国西部资源地区与消费地区间的合作机制^[2],打造东西双向互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3]。有学者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4]。必须深化南北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优化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强化城市群带动作用^[5],从单维发展转为多维发展,从独立发展转为联动发展,着力构筑南北方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6]。还有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大一直是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7],必须协同推进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收稿日期:2025-05-12

作者简介:谢小飞,男,法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23年度新时代育人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研究”(2023xcxysj029);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甘肃文化遗产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研究”(2024ZX020)。

略^[8],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新型城乡关系,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9],从而在城乡发展成果惠及于民的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0]。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对于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并产生一批重要成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和加强。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本质要求。深入发掘和系统梳理我们党百年来以区域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于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认识形式和具体样态,阐明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过程,总结我们党以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推动共同富裕的启示,对于新时代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无法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只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才能为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和富强的道路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谋求国家独立的同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针对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民族工商业以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等,实施了一系列统筹兼顾的措施和方案,成功应对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为追求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依然贫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巩固政权和恢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特别是在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听取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中,详细阐述了统筹兼顾的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坚持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进而逐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

(一) 统筹推进沿海和内地的共同富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由此导致沿海与内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为了改变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现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沿海和内地人民的共同富裕,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思路。

一方面,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不但水平低,而且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为了促进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分布,达到区域的平衡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遵循“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11]310}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必须改变工业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并逐步提出了“大力加强内地的工业建设”^{[12]486}的方针,特别是当时还处于国际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进行内地工业的建设。为此,一是通过实施“一五”计划,重点加强内地工业建设,通过将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的五分之四放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形成了以成都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兰银地区为中心的重工业建设基地,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二是通过实施“二五”计划,进一步加强内地工业的建设,形成了以西南、西北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基地,建立了一些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区域经济,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三是在“三五”和“四五”时期开启了“三线”建设的方针,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我们党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中西部,推动了中西部的工业建设。就当时来看,开启“三线”建设主要是为了加强国防,为加强国防事业而进行的战略调整。但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沿海地

区的企业、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积极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初步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为内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缩小内地经济与沿海经济之间的差距,推进沿海和内地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内地工业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毛泽东同志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指出,如果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13]26},并指出这才是推动内地工业发展的正确方针,并对坚持这一方针的原因进行了阐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沿海工业的技术能力和设备能力可以推动沿海工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为内地工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技术设备支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13]26} 因而绝不能对沿海工业的发展采取消极态度,必须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既能够促进沿海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能更好地为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从而推进沿海和内地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 统筹汉族与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仅包括汉族地区的富裕,而且包括民族地区的富裕。由于历史发展机遇、人口数量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民族地区相对较高。因此,为了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推动民族地区的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党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一方面,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拨、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等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使得我国依然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甚至冲突。为了消除民族隔阂,推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党和国家对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重点批评了全国各地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1953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批判大汉族主义》中明确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14]269} 此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13]227}。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同志在阐明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二者都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尽管地方民族主义在影响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处于从属地位,但也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阐述了必须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才能克服错误思想,实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

另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为了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3]34} 并对其实现途径作了探讨。例如,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国家支援的方式大力帮助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等。此外,民族地区群众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通过依靠自身的力量才能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事实证明,在国家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下,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非均衡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为了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带领广大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提高效率、快速发展经济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 实施“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对社会主义存在狭隘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在财富分配方面不能出现差

别,只有搞平均分配财富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加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影响,导致人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富裕起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澄清了共同富裕内涵上的认识误区,果断摒弃了之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人们追求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当然,我们党在提出“部分先富”的同时,也时刻强调必须防止和克服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正是对于先富、再到共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清醒认识,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其目标是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使内地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谈到“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时就指出:“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15]152}体现了对中西部地区的重视。此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强调先富起来的地区要通过税收调节、区域之间的互助以及倡导民间力量来举办公益事业等方式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并进一步阐明了使中西部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对于整个社会持续健康的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至于何时实施支援内地的战略构想,邓小平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6]374},这是将第二个大局置于“三步走”发展战略之中,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地预见了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将会更加雄厚,必须将共同富裕置于中心议题的位置加以研究,才能避免两极分化,推动整个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进而使全国所有地区的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 由非均衡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国家的经济整体上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不可否认也造成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生活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构成了挑战。立足于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现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全新的眼光,明确提出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7]466},这是对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其根本目标就在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基础上,多次阐述了必须把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的思想,并于1999年6月9日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8]855}同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举行的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一项宏伟的巨大工程,不仅是对邓小平同志“第二个大局”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而且“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8]1380},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具体而言,其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更加重视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并适当给予其政策上的倾斜。例如,在引进外资、贷款、税收、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特别是在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以国家投资为主,加大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中西部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江泽民同志特别重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并明确指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19]172}如长江三角洲是以上海这个龙头城市作为经济活动中心,因而可以在借鉴东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集力量完善城市功能,从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三是转变思想观念,实施东西对口扶贫协作计划。解决贫

困问题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1994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致力于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随着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推动了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于20世纪末基本解决了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改变了贫困地区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有利于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稳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19]136}在举全国之力迅速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基础上,党中央“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观念,并于1996年10月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东西对口扶贫协作计划,目的就是在扶贫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从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新世纪,人民群众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之一。^{[20]651}致力于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此,我们党对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653},致力于扭转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推动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历史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跨越,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党领导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在这一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了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益健全、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等,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推动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城乡收入差距大、发展不协调依然是阻碍共同富裕的因素。因此,必须坚持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促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 坚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肯定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阶段仍然面临着不少突出问题和挑战。为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等都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深刻表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和内在要求。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公共服务全覆盖目标是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民众,所有地区和所有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等,强调的是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党和政府在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始终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致力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1]35},为新征程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方向指引。

其二,优化资源配置,着力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一方面,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我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这种结构使得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质量上的差距仍在扩大。为此,国家必须“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21]22}。继续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养老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达到与城市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进而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调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情,如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的差距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这就需要不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逐步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使不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才能为这些落后地区后续的发展以及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提供基础的条件。

其三,加强模式创新,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文中特别强调:“促进共同富裕……重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22]表明必须进一步加强模式创新,采取多种方式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一方面,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持续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同时,为了解决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农村相对薄弱的问题,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如通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既可以将城市资源辐射到农村,又可以加强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模式创新,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在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要通过市场参与的补充方式充分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来有效补充政府供给的不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进而确保在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而实现这一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动农村的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导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难题,因而必须继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推动农民农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一是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面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活力不足、融合程度较低的现状,只有聚焦乡村产业,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乡村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乡村产业的多功能性,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中增强竞争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3]26},这是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二是在推动城乡融合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和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1]22}。这表明以城乡融合发展消除各类导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因素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三是广泛吸纳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人才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力量和重要保障,必须着力在用才、育才、惜才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积极构建与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相适应的乡村人才队伍体系,同时“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乡村人才的待遇水平”^[24]。如此,方能更好地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总之,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为今后乡村发展、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四、总结与思考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解决了共同富裕这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仍像顽疾般困扰着人类社会,但我们不能基于此就认为共同富裕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新起点上,总结中国共产党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什么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不同阶级、社会组织以及各个政党的价值追求,是检验其性质的试金石。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能否使人民满意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人类解放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是其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就是促进无产阶级解放,让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中始终把捍卫群众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放在第一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为民本色。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求幸福,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正是人民群众愿望的现实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以革命的方式开启了探索共同富裕的历程,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5]²¹,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进入新时代,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要求,我们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共享”的协调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实践证明,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6]³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 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和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如果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那么无论用什么办法进行分配,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做大“蛋糕”,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筑牢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一再强调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明确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了正确道路,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立足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扩大经济总量,将“蛋糕”做大,这是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同时,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在缩小收入差距中促进共同富裕。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充分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效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在我国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我国采取了“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在肯定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这就要求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提低、扩中、调高”为抓手推动构建“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才能推动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 弘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历史主动精神”的创新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历史主动精神”这一重要概念。“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要在遵循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自觉顺应历史大势和承担历史责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持之以恒开创历史伟业的精神品质。建党百余年来,从“均中求富”的方式到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从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是对以平均主义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的否定,实现了由“平均”向“协调”的理论飞跃。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充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重大历史关头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推动我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步伐,从而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直面困难、敢于斗争,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挺身而出,做到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而夺取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进一步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新征程上,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既需要跨越许多“雪山”“草地”,还需要征服许多“娄山关”“腊子口”。只有主动出击、迎难而上,才能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凝聚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进而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26]419} 此观点彰显了新征程上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才能更好地推动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参 考 文 献]

- [1] 杨培祥,吴文新.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23(10):133-140.
- [2] 全毅,曾志兰. 我国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机制探索[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1-82.
- [3] 刘耀彬,郑维伟. 打造东西双向互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J]. 华东经济管理,2022(2):1-11.
- [4] 李晨.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J]. 广东社会科学,2024(1):274-283,287.
- [5] 于泳莲,邢文利. 共同富裕视域下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24(3):121-129.
- [6] 王颀雨. 共同富裕愿景下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点与政策转向[J]. 新疆社会科学,2022(5):30-40.
- [7] 张耀军,张玮. 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J]. 区域经济评论,2022(4):5-15.
- [8] 黄群慧.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J]. 金融理论探索,2022(1):3-9.
- [9] 文丰安. 新时代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论——基于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72-285.
- [10] 陈健. 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4-26.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2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2]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知,2022(6):4-7.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4] 文丰安,杨婷.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内在关联、逻辑理路与理性审视[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5-16.
- [25]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d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Xie Xiaofei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730070, China)

Abstract: Formulating scientific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s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evol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seeking wealth through equalization" to "leading the less affluent regions with the more prosperous ones", and from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o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 forms of understanding and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have emerged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primarily reflected as follows.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efforts were made to advance common prosperity across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as well as Han and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hrough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no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eading the less affluent regions with the more prosperous ones" was transformed in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coordination has been enhance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 review of the Party's tumultuous history reveals that formula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must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vigorously liberate and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uphold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ese insights will provide crucial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our Party to continue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journe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urban-rural gap; regional coordin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